

汉语
新诗
的
诗
意
变
形
记
移

Drifting
o f
Symbols
i n
Modern
Chinese
Poetry

颜
炼
军
■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象征的漂移

汉语新诗的诗意变形记

颜
炼
军
■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象征的漂移: 汉语新诗的诗意变形记 / 颜炼军 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495—6026—4

I. ①象… II. ①颜…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4977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责任编辑: 吴嫦娥
装帧设计: 刘侯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31260822—882/88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690mm×960mm 1/16

印张: 22.5 字数: 210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序

语言如果成立，意义自会显现

赵 野

一

我还记得读到《祖先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时的欣喜，我读到了触及到汉语诗歌秘密的文字。那是去年秋天，一个与那篇文章的意蕴和表述相契的季节，我正在思考“兴”与中国当代绘画之间，能否找到一种联系，之前我已相信，“兴”是中国诗歌甚至中国文化里，最迷人也最本质的一个概念。文章发表在泉子编的《诗建设》第10期，作者是颜炼军。窗外天空高远，落叶悠然，我在心思往返中，记下了这些对我深有启发的语句：

“兴”通过所命名或指涉之物，来完成人与神之间的往来，亲证了世界“看不见”的部分。

“兴”是事物、语言和经验之间的相互唤醒，三者的叠加、回响，呈现的是一种内在的自由。

汉语新诗必须建立起自己描写新的经验和事物的自由传统和词语魔术，建立起新的“写物”之辞，与新的物外之“意”契合，以新的、敞开

的形式来安排事物和经验的秩序。

“兴”在脱离了神话和宗教意义后，……依然作为一种“野性的思维”……不断促成物我之间充满惊讶的遭遇和共鸣。这是一种心与物之间的自由回响，是一种想象的自由，也就是诗意的自由，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对人神共处的自由状态的永不疲倦的模仿。

二

敬文东兄为人为师，皆有民国风范。数年前就向我多次提起他的几个学生，颜炼军，张光昕，曹梦琰，说是为中国诗歌找到了几颗好苗子，深感自豪。炼军好像早早去杭州了，几次私下酒局，文东带着光昕和梦琰前来，我和他们已熟悉。后来我曾代《艺术时代》杂志，约光昕写了一系列诗学文章，梦琰则受师命，写过一篇我的评论，他们二人的才情、见识及文字，不负乃师夸誉。文化本是一种传承，需要一代代薪火相传。

我和炼军后来在公共活动中，打过一两次照面，北京的匆忙熙攘，不会让人在这种照面里，对谁有较深的印象。张枣仙逝后，我知道炼军花了很多功夫，编辑出版他的诗集和随笔集，其诚昭昭，其心眷眷。我和枣兄相识二十多年，一直认为他是这一百年里最大的语言天才，其对汉语诗歌及汉语本身的贡献，应该成为当代文化极为珍贵的部分。炼军倾心于此，想来除了报师恩，也是持有同样的价值判断。

去岁末在上海见到何言宏兄，向他提起炼军的这篇文章，他说这只是炼军博士论文的一章，我遂满怀期待，向炼军要来这份全稿《象征的漂移》。

短信沟通中,知道他生在大理乡下,长于苍山洱海间,就更多了一份亲切。大理啊,那是中国我最喜欢的地方,我和好多朋友的终老之地。

三

波德莱尔定义的现代性,一半是瞬时、即兴、变化,而另一半是永恒。尼采说上帝已死后,西方古典主义诗歌丧失了神性的基础,诗人们独自面对巨大的虚无,成为现代社会的外人。最好的现代主义诗人,波德莱尔、马拉美、里尔克、艾略特、叶芝、庞德、奥登一脉,则通过重新激活古典神性资源,建立新的现代抒情神话,书写新的崇高性,将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和消极性,转化为有效的抒情,从而证明了现代主义诗歌的诗意能力。

汉语古典诗歌,有着更悠久的传统、丰富性和成就。古典诗歌世界具备坚实的形而上学基础:“原道”,对不可企及的世界本质的遵循;“征圣”,对圣贤高士理想人格的追慕;“宗经”,修辞立诚,不逾矩。两千年来,语言与事物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精致的、几近穷尽的诗意,源源不断为古典中国的日常生活输出崇高感和美感。当天下体系崩塌,古典诗歌的形而上学基础随之解体,诗人面临诗意的巨大空白。

本书一开篇,即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为参照,优美表述了汉语诗歌的根本性特征,和遭遇的现代性困境,并高蹈指出现代汉语诗歌,应该化解和分担这场浩大无边的生存危机,写出存在中的难言之隐,把生活、历史乃至世界的一切,内化为诗的崇高,彰显现代中国人存在本质的诗意性。“没有诗意进取,现实便不能独自成立”,这个断言有着古希腊的自信和明确,难道

这就是我们要建立的新的形而上学基础？

在今天，一个成熟诗人一定要能回应这些价值观，让世界的梦想，存在于一首诗中。

四

1946年，隐匿在浙东乡野的胡兰成，以逃亡之身，不忘天下志，开始著述《山河岁月》，在中国文化中，独挑出一个“兴”字，来展开他的历史抒情。胡兰成认为礼与乐是中国文明的基础，而“兴”正代表了乐的精神。在胡兰成那里，“兴”是万物的自然呈现，“大自然的意志之动为兴，大自然的意志赋予万物，故万物亦皆可兴。诗人言山川有嘉气，望气者言东南有王气，此即是兴。”

胡兰成的历史抒情，有些似是而非，大而无当，用在审美范畴，却很精妙。诗人具备一种古今同在、当下永恒的能力，“兴”正是抵达的要隘。明了“兴”，即能明了汉语独有的那份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本真自然。“兴”的奥秘与滋味，不独属于中国古典诗歌，而是属于汉语和汉语文明。新诗要在一种新的经验下，赋予事物以新的感觉和情欲，重建与世界的亲密关系，“兴”无疑是再生的一个原点。它可以唤醒我们业已迟钝的对物的通感，把倍受现代性与意识形态双重蹂躏的语言，集合成美的冲锋队。

炼军在书中对“兴”的辨析，完全契合了我多年所思。当代语言晦暗不明，“兴”是幽微之处一道被遮蔽的光。汉语需要它的探路者和突进者，我们也许应该集体前行。

五

二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说现代汉语还不成熟,后来我又多次陈述过同样的观点。在世界文明史里,现代汉语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关系,与古英语和现代英语的关系,一定有根本的差异。古汉语的书写语言,是独特的文言文系统,和日常说话全然不同。明清的白话写作,几近口语,当时不是主流。“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语言上完全废弃了文言文,采用白话写作。白话文应被看作一种新的语言,其句法、节奏、气息,都是口语的,它的词汇构成,却来源于日常用语、翻译语言和文言文。后者其实是基础与核心的部分,能带出整个汉语文明与历史,让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充满可能性。当时,翻译文体压倒性覆盖了新诗的写作,我很少看到这种敏感、认识与成果。

《风雨如晦》一章,即我最初读到的《祖先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最能见出作者的见识,及对汉语的微妙把握,触角伸到了很深的地方。汉字的象形性,赋予汉语丰富、多义的质地,汉语诗歌中人、神、物之间的象征和呼应,充满各种契合点,彼此在召唤和暗示,而这一切的实现,正是通过“兴”。这正是汉语的诱惑所在,我不知道今天的诗人,有多少能领悟到这点。

我以前写过一段话,可与炼军互证:汉语是有思想的语言,我们现在使用的每一个字,在起源上都和世界万物有着某种特定的关系。中国文字一开始,就有丰富的隐喻性。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即是

说,诗中有世间的秩序和万物的象征,我们读懂了诗,就能知晓山的静默,水的流动,以及鸟兽草木的鸣叫生长,对我们命运的影响和暗示。迹象即征兆,一切皆有深意。汉语诗歌的秘密,或迷人之处,就在于呈现物与物,或象与象之间的内在关系。

六

如果相信一句老话,太阳底下无新事,我们似乎可以说,西方各大语种的诗人,已经穷尽了他们的一切可能,如史蒂文斯所说,“天堂与地狱的伟大诗篇都已写下”。当代中国诗人因为现代汉语的独特性,和他们有着不一样的处境。我们还未涉及天堂,未涉及地狱,只是纠缠在尘世里,也没有留下几个经典的文本。还有太多的经验没有处理,命名没有完成,命运没有呈现。自信如张枣,尽管认为汉语已“可以说出整个世界,可以说出历史和当代”,也承认这还是一种表面上的成熟,“它更深的成熟应该跟那些说不出的事物勾连起来,这才会使现代汉语成为一门真正的文化帝国的语言。”

现代汉语的三个来源,日常用语源源不断有鲜活感,却边界有限;翻译文体让我们感知别的文明里伟大的经验、思想与感受力,但诗歌终究要有本民族的文化属性,和母语的节奏与气息;古汉语背后有整个汉语文明与历史,想到这点就令人动心不已。炼军洞见如是:古典诗歌中物与志,或者说象与意之间原本固化的对应,被白话文学革命解除后,词与物在现代汉语中获得了完全自由,使我们可以重返世界原初的无限与澄明。“每一个时代的诗歌,所要发明的,正是对称于这个时代的词与物的关系。”问题是我们

作好准备了吗？

这样终于回到了传统问题，我现在相信，对一个当代汉语诗人来说，对自己的传统认识多少，了悟多少并最终转化多少，可能最后决定他能达到的高度。

七

接下来作者梳理了新诗中的写物形态，祖国隐喻，天鹅形象，抒情主体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部分中规中矩，标准的体制下论文。印象较深的，是张枣诗中鹤与燕子的美妙分析，至于天鹅在汉语中，我一直有种怪怪的感觉。就文本而言，我对中国现代诗歌评价不高，尽管年轻时受惠于他们。按艾略特的说法，这是语言和时代的不成熟，与人无关。才情、修养与学识，那批诗人个个大家，我们望尘莫及。

在这本书最后，我看到了炼军的忧心，一个诗歌的使徒，站在危岩边警示来者：比西方现代诗歌晚了近一百年，当代汉语诗歌也完全进入它的虚无主义时代，古典社会中那个侵染着汉语诗歌精神，指引世间万物的彼岸世界已然远去。诗人的象征性发明日益困难，诗歌如何写下不可企及、心向往之的崇高性？或者说，新的言路如何创建？

这是一个相当宏大的命题，而且是批评者的立场，每个诗人会有自己的回应。在网上读到黄灿然对张枣的访谈，张枣说诗歌写作的三个阶段像悟禅：开先的时候词是词，物是物，两者难以融合；后来词物相交，浑然一体，写诗变成纯粹的语言运作；真正难的是第三阶段，这时词与物又分开了，主

体也重新出现,三者对峙着构成关系,这时主体最大的不同是他已达到某种空以纳物的状态,居不择地,内心充满着激情理解和爱。彼时我心中暗叫:枣哥,天才啊,我们还在追求词即物,你已经到了更高一层境界。归根结底,诗歌写作是语言的事,诗人的一切梦想皆取决于此。其实我真正要表达的是,语言如果成立,意义自会显现。

近日与友人谈中国何以是中国,历史与文化俨然两极。历史无道凶残,万物为刍狗,文化却一次次重生,坚韧如是。我以为天下观、士的传统以及乡村社会结构,是中国文明数千年来终能万劫如花的根本,今天这三者都被连根拔起,我们可否寄望诗歌承负这个使命?

八

在我全然不顾自己的能力,答应为这本书作序时,一定是它有深深触动我的东西。作为一个当代诗歌写作者,通过语言来构建一个完全自足的世界,呈现中国文化审美和精神特质,是我多年的愿望。我希望我的诗歌里,有一个生动的汉语文明心灵,如草木在阳光下。我不能确定我在这本书里看到的,就是作者本来的意思,也许我完全单向化甚至误读了他的诗学。如果真是这样,正好证明了汉语含混的魅力。现实要求一种明晰,而美总是漂移的,如同世界的本质。

现在我想说,这是一本懂诗的人写的非常内行的书,对汉语诗歌作了全面深入的思考,抵达了一些问题的内核,有着真正的发现。当然诗人不一定要搞清楚这些才写作,诗歌需要更深邃的天赋。

我还想说,这本书视野开阔,富有启示的说法和极具灵感的论述比比皆是。相比于它已突破的部分,另外一些篇章略显平凡,它的文字也还可以更简洁紧凑,至少离一种理想文体还有距离。如果严格一点,它还可以继续打磨,包括对作为范例的诗歌的选择,和对它们的阐述,都有低于作者能力的时候,有些解析落入了俗套。我当然知道批评和创作完全是两回事,诗人更在乎语言质感,和特别微妙的地方,所以会对那些无关本质的批评不以为然。

在这个时代,也许我们不应该要求更多。事实上这本书已经很好了,已经足以值得我们关注和尊重。

前言

本书想探讨和呈现的,是百年来不同时期的汉语新诗言说或命名崇高性的基本状况,这在书名中已经有所体现。其中包含四个关键词:象征、漂移、崇高、变形,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本书的意图和主旨。

本书中运用的象征概念,借自欧美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当然,这里的浪漫主义,是广义上的浪漫主义,按照德国浪漫派诸家的说法,即人类从古典时代退场,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的所有诗,都可以被命名为浪漫主义诗,包括象征主义以及其他现代主义诗歌——如果按美国现代诗人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话说,现代诗歌是“超级浪漫主义”的。在欧美浪漫主义传统中,象征即在“诸神死了”之后,诗歌在人与世界之间重新建立的和谐诗意关系的努力——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的定义是,作为现代艺术的诗歌要“创造一种暗示的魔力,同时包含着客体和主体,艺术家之外的世界和艺术家本身”。^①这种“暗示的魔力”,这种向往“人造天堂”的诗心,亦即在神灵远逝的世界,诗歌抒情的可能性所在。象征的这一含义,几乎可以囊括欧洲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诗核心追求。

汉语新诗是在古典中华帝国及其依赖的整体世界观解体之后,汉语修复和萃取现代中国人与世界之间的诗意关系的语言结晶。其象征形态,即

① [法]波德莱尔:《美学珍玩》,郭宏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页256。

在以古典汉语为基础的汉语诗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之后,现代汉语所捕捉、创造的关于现代化中国的诗意形态。汉语新旧诗之间的这种更替,与西方古典诗与现代诗之间的更替相比,也有某种一致之处:都是基于世界观的深刻变化及其引发的诗意空白而来。中国是一个被迫现代化的古老帝国,在二十世纪以来的不同时期,其追求的现代化主题和方式也有所不同。因此在不同时期,甚至在相同时期的不同新诗写作追求中,汉语新诗象征抒写的重心也不同。本书选取了若干代表性的、同时有所交叉的象征形态,借用地球物理学中的“漂移”概念,来呈现汉语新诗的象征发明是如何在不同的维度上、又互有关联地展开的。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说,现代以来,“人类似乎分裂成两种类型:一种人相信人无所不能(他们认为,只要懂得如何组织群众,那么一切就将是可能的);另一种人则认为,他们生命中的主要经验是无力感。”^①与此对应,在欧美近现代诗歌传统中,既产生了积极的革命诗歌,也产生了咏叹神性缺在的哀歌,对此,波兰诗人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的精到归纳可以作证:“在二十世纪,各种流派和宣言可以分成两大阵营:一方面是赚钱花钱者,连同他们对工作的崇拜、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爱国主义;另一方面是波西米亚,他们的宗教是艺术,他们的道德是否定另一阵营承认的所有价值。”^②这便是欧美现代诗中的两大主流。前者的写作,以革命理想或乌托邦作为自身的内在驱动力,建立起了一种新的个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比如惠特曼、聂鲁达、马雅可夫斯基等;后者的写作,则常通过重新激活古典神性

① [德]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初版序》页1。

② [波兰]切·米沃什:《诗的见证》,黄灿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35。

资源,来建立新的现代抒情神话,抒写新的崇高性。从德国浪漫派诗人对现代性的第一次诗性反思,到波德莱尔、马拉美、里尔克、艾略特、奥登、史蒂文斯等现代诗人的写作,几乎都有这一特征,只是各自依凭的神性资源有所不同。

从十九世纪开始爆发的各种乌托邦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先后退潮,使革命诗歌写作也逐渐随之终结。对于现代化的各种后果的反抗,赞颂现代性忧郁,成了现代诗从早期浪漫主义诗歌那里继承的最重要的遗产。米沃什说,此后的诗人真正变成了现代社会的“外人”。德国诗人贝恩也说:“现代诗,绝对诗就是没有信仰的诗,没有希望的诗,不为谁写的诗,具有魅力的词语组合之诗。”^①二十世纪汉语新诗写作,也与上述的两大世界性诗歌传统密切相关。不同的是,由于特殊的现实处境和政治人文传统,汉语新诗沉迷于政治乌托邦和民族国家理想的时间较长,对抗和反思现代化运动的精神传统一直较弱,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一传统才逐渐成为诗歌追求的正宗。基于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诗歌史特点,在汉语新诗短暂的历史上,不同的诗意梦想先后“漂移”于不同的象征形态之间,诗歌追求崇高性的姿态,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形。

基于上述理解,本书以梳理现代汉语美学和诗学中的诗意崇高性理解为前提,从新旧诗关系,现代汉语新诗中的写物形态、新诗中的祖国隐喻、当代新诗中的天鹅形象,当代新诗抒情主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角度,描绘出汉语新诗崇高性追求的基本图景,进而展现汉语新诗对于现代中国的表现力——其中包括对现代中国人的主体意识、民族国家梦想、语言意识以及形

① [德]戈特弗里德·贝恩:《贝恩诗选》,贺骥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423。

而上学意识的表现;包括对古典传统丧失后陷入的空白处境的表现;包括对革命崇高性资源几乎耗尽之后的处境的表现。这些表现类型,在各自的限度之内使汉语新诗走向成熟。

通过上述诸方面的展开的诗歌史视野,我对当代汉语新诗的处境得出如下的观察:汉语诗歌面临的,不仅是自身独有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现代化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危机。虽然在不同的诗歌传统中,现代化危机产生的症状和形态有着具体的不同,但如何抒写人们日益丧失的自然、大地和天空宇宙,如何在被现代化的物质形态拥堵的人类生活中寻找言说的灵韵,已然人类诗歌面临的共同挑战——对这些问题的表现,是发端于欧洲的浪漫主义最具生命力的诗学遗产,也是汉语新诗正在进行的艰难使命。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无论在写作或批评中,在充分发掘可能的汉语诗意资源的同时,特别需要对各种民族主义和伪民族主义的诗学立场持有足够的警惕。王国维之言犹在耳:“知力人人之所同有,宇宙人生之问题,人人之所不得解也。具有解释此问题之一部分者,无论其出于本国或出于外国,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则一也。”^①

既然说到诗歌面临的挑战,我们得倾听一直与挑战伴随的关于诗歌危机的各种声音。在不长的历史上,各种新诗危机论一直不绝于耳。事实上,在西方,自资本主义兴起以来,诗歌危机论也不断地以各种面目被抛出。有意思的是,历史不断地证明,现代诗的诗意能力,恰好在于它能够将各种危机和消极性(negativity)化解为有效的抒情,成为悲欣交集的见证。

简单地说,在中西古典时代,世界带给人类的威胁和打击,多由于人在

① 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99-100。

自然、宇宙和历史之下的卑微无力。依据各种古典式的世界观和自然观,人将这种与世界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在诗歌的象征世界中平衡化,从而获得言说的出路和福祉,这是古典诗的基本象征逻辑。相较之下,现代人面临的,是如此多的人类发明的事物所包围的世界,它们根本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形式、生存空间和精神结构。随着古典象征世界所保证的幸福感消散,虚无主义世界的升起,人类及其生活的世界变得愈发孤独无助:“虚无是我知晓的唯一上帝”^①,“我们害怕梦想与失败本是一回事”。^②当然,刚在过去不久的历史上,一度有诗人试图歌颂近代科学,歌颂工业化,但随着上述人类生存危机的日益深重,这些对现代化的颂歌都销声匿迹了。这恰好表明,真正安慰人类灵魂的诗歌,最终都朝向人类陷入的共同精神处境;因此,现代诗面临的抒情危机,某种程度与人类面临的危机互为表里。现代诗歌表达的希望,也是对于人类的希望。

如果诗歌能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化解和分担现代化导致的这场浩大无边的生存危机带来的艰难,那么,就像古老的先知的箴言一样,它们中的杰作不仅是现代人克服言说之难的可贵的结晶,也可能预示着我们突出现代化危机重围的曙光。米沃什说:“要是当今诗歌中如此广泛扩散的哀叹之声最终被证明是对人类置身的无望处境的先知式反应,那将会怎样呢?”^③倘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当代汉语诗人付出的可敬的、默默的努力,那么,诗歌抒情的危机,正是无时无刻地潜伏在我们生存中的危机所在,诗歌的咏

① [法]拉马丁(Lamartine):《沉思集》,张秋红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页64。

② [美]华莱士·史蒂文斯:《最高虚构笔记》,陈东飏、张枣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159。

③ [波兰]切·米沃什:《诗的见证》,前揭,页101。